

一 盖棺论定“山西王”

（一）阎锡山的一生这样走过

山西省境之北，忻定盆地边沿，五台山侧，滹沱河畔，坐落着一个美丽的村落——河边村（原属五台县，今属定襄县）。曲曲弯弯的滹沱河水，宛如一条玉带从村东流过，滋润着一方水土，哺育着世代代的河边人，创造了“（五台）县不如（东冶）镇，镇不如（河边）村”的传奇历史。然而，河边村在中国近代史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却不是得之于她的美丽和富饶，而是因为被称为“山西王”的阎锡山从这里走出。

1883年（清光绪九年）农历九月初八，阎锡山（字伯川）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一个亦农亦商的小康之家。父亲阎书堂（字子明），承继祖上经商致富的传统，既在河边有几亩薄地，又在五台县城经营着一爿小店——吉庆长，兼作杂货生意和出“钱帖子”。

阎锡山系家中独子，从小娇宠有加。5岁丧母。6岁入村中私塾开蒙。先后接受了近十年的旧学教育，《诗经》、《礼记》、《春秋》、《左传》、《纲鉴易知录》、宋明理学等无不涉猎并习作八股文。15岁到16岁期间大约有一年多时间，曾辍学习商，在吉庆长学徒，从待人接物到打理生意，样样上心。17岁以前的经历，不仅为阎锡山初步奠定了旧学基础，而且使他对社会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

1899年岁末，吉庆长经营金融投机买卖失利，累亏合银六七千两，难以为继。阎锡山的人生道路因此而发生变化。初涉世事即受挫折，青年阎锡山饱尝了世态的炎凉，“有用于时”，出人头的思想油然而萌发。于是，经过一年多的复读私塾和认真反思后，1901年春节，阎锡山就随父离乡，到了山西省城太原。先落脚“裕盛”商号，边当伙计边学习。随即，应山西武备学堂试，考中入学，研习军事。就读三年，成绩优秀。

1904年，阎锡山被山西省选派赴日公费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继入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再进陆军士官学校。在此期间，1905年，加入同盟会，成为早期的同盟会员之一；1907年，参加“铁血丈夫团”，成为革命党的军事中坚。

1909年，阎锡山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结束留学生活返回山西，任职山西新军。初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官，继升陆军小学监督。同年11月参加清廷举办的归国士官学生会试，名列上等，得赏步兵科举人；12月，山西新军编为暂编陆军第四十三协，下辖第一、第二两标，随即改称第八十五、第八十六标。1910年，阎锡山升任第八十六标标统。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同年10月29日（农历九月初八），经过长期的准备发动，阎锡山率领所部参与起义，光复太原，并被推举为山西都督，组织军政府，开始了他执掌山西大权近四十年的历史。

太原地处京师肘腋，光复后的山西革命力量处于清廷的严重威胁之中。为了变不利为有利，阎锡山与奉清廷之命进军山西、镇压革命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密组“燕晋联军”，筹划以山西民军开赴石家庄，截断京汉路，直接威胁北京。在燕晋联军因吴禄贞的被刺宣告失败，山西的东大门娘子关又被曹锟第三镇攻陷之后，阎锡山作出分兵决定，与副都督温寿泉各带一路人马，分赴北南。北路由阎锡山亲自率领，一路北上，过黄河，攻陷包头、萨拉齐、托克托

等重镇（清时这一带属山西的四道之一——归绥道管辖）。

1912年4月，在南北议和达成，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迁北京的政治形势下，阎锡山率北路民军返回太原，继续行使山西都督的职权。此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在袁世凯专制统治的控制下，阎锡山从维护既得利益、维护山西安定出发，韬光养晦，多方肆应，甚至不惜拥戴袁世凯称帝。从而使山西成为在袁世凯执政时期惟一没有被撤换都督的省份。

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败亡，北洋政府对山西的控制逐步减弱。1917年6月，阎锡山以督军（1914年都督改称同武将军，1916年7月再改称督军）兼省长（先护理，后特任），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山西王”。

兼长山西军民两政后，阎锡山一面倡导“保境安民”，置身于军阀纷争的漩涡之外；一面推行“六政三事”（“六政”系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三事”包括种棉、造林、畜牧），实施“村制”和“村本政治”。在改良农林水利以及畜牧等业的同时，鼓励发展实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扩充军事实力（扩充军队和发展军事工业齐头并进），为山西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赢得了—个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行政管理、文化教育诸方面的成就，山西被誉为“模范省”。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阎锡山挟数年蓄积之锐气，站在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的立场，出兵石家庄对直军作战，牛刀小试。1926年春，奉、直、直鲁联军展开“讨赤”（即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之役。鉴于冯玉祥的国民军扩充迅速，图谋向山西发展，已对山西形成包围之势的事实，阎锡山默许吴佩孚、张作霖参与“讨赤”。

是年5月，国民军分数路进攻晋北地区。晋军（其时，阎锡山属下的军队已扩充到十余万，成为颇具实力的地方武装，晋军由此得名）依事先部署投入，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你争我夺，胶着于大

同及其附近地区。8月，国民军不支，开始撤退，晋军乘胜追击，一举占领归绥（今呼和浩特），把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绥远地区（此前归绥系国民军亦即西北军所有）。1927年4月1日，阎锡山宣布废除北洋政府所任命之山西“督军”，改称“晋绥军总司令”，将所部山西、绥远各军队改编为晋绥军。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革命”爆发。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此后，北伐军势如破竹向北挺进。与此同时，1927年6月，阎锡山接受蒋介石“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委任，悬挂青天白日旗，改晋绥军为北方国民革命军，加入讨奉序列。声称：“本总司令因所处之环境，至为恶劣，所挟之势力，至为微弱。且民众亦缺乏组织与训练。吾苟显明其主义与政纲，无异自树一的，以待此等敌人之共同进攻。而环绕吾人之左右者，日夜思颠之覆之，欲置吾人于死地。为保留大河以北微弱之革命势力，与三民主义设障碍者虚与委蛇，十四载于兹矣。设使孤军转战，其失败必无疑也。”9月29日，阎锡山以“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为题发表讨奉通电。随即，指挥所部北方国民革命军从指定位置向奉军发起进攻。是为阎锡山的第一次北伐讨奉。

第一次北伐因兵力不足，蒋介石的宣布下野，以及奉军的集中优势兵力等主客观原因而遭遇严重挫折，不得不暂时撤回山西省境，据险固守。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3月，下令各集团军进行北伐。晋军再次改编，称为第三集团军，加入北伐军序列，阎锡山就任总司令。同年4月4日，阎锡山指挥部署调整后的第三集团军从正太路发起进攻，矛头直指北洋军阀的最后堡垒北京。一路攻平山，占石家庄，下保定。在奉军向关外撤退的形势下，6月6日，进占北京（后改称北平）。随即，和平接收天津，克复察、绥。北伐一役，阎锡山是最大的赢家，势力范围由晋绥一举扩大到平、津、冀、察。

北伐胜利是四个集团军协同作战的结果。战后，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各据一方，与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蒋介石从“统一”出发，力主编遣，并由此引发了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与冯玉祥联合反蒋，演成了国民党史上参战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内战。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被迫下野，避走大连。

1931年8月，阎锡山从隐居的大连秘密潜回五台河边村。同年9月18日，日军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2月，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总负晋绥绥靖之责。

复出后的阎锡山以“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相号召，一方面“以政治为中心，注重扫除建设障碍”，一方面“以经济作中心，以完成‘自足为目标’”，发起“山西十年省政建设”。创办西北实业公司，修筑同蒲铁路，创设四银行号——山西省银行、绥西垦业银号、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晋北盐业银号，实行统制经济，开展土货运动。同时提倡“公道主义”，主张“土地村公有”，极力抵制共产主义。随着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加深，阎锡山再以“守土抗战”相号召，成立抗日救亡团体，组训民众，发动绥远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阎锡山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组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部署晋绥抗日军政，负责指挥晋绥军编成的第六、第七两个集团军，以及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第十八集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战初期，阎锡山出兵南口，督战岭口；部署大同会战，组织太原保卫战；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扶持“牺牲救国同盟会”，批准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建“青年抗敌决死纵队”，开办“民族革命大学”，颁布抗日法令。第二战区因此而被誉为“模范战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阎锡山一度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生摩擦，并以反共的十二月事变把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推向峰巅。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阎锡山属下的第二

战区长官司令部偏居晋西一隅，其军队所能控制的地区只有晋西六七个完整县。外部日军封锁，内部财政极度拮据，供给严重不足，困难重重。阎锡山提出“克难”、“求存”的口号，开展“克难运动”，发动“大生产”，实施“新经济政策”和“兵农合一”。同时，组织“三三铁血团”，加强内部控制；秘密与日本军方接触，缓解外部压力。

抗战胜利，举国同庆。阎锡山率部径返太原，接收政权，再坐“山西王”位。与此同时，指挥所部迅速占据临汾、运城、大同、上党等主要城市。在八年敌后抗战一朝得胜之后，阎锡山继续坚持他的反共立场，决计消灭昔日的同盟者共产党及其武装。岂料事与愿违，上党战役，损兵折将，长治及其周边地区得而复失；晋南、晋北、汾孝、正太诸战役，留下的仍是一页页失败的记录。不到两年时间，阎锡山的辖区即只剩下太原、大同、临汾等几座孤城，及一些零星县份。江河日下，彻底失败已成定局。整肃内部，实行白色恐怖，也无济于事。1948年5月，兵败临汾；1948年7月，晋中平原尽失，不得不退据太原孤城，困兽犹斗。太原城破之前，阎锡山据代总统李宗仁“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的电文，乘专机飞抵南京。1949年4月24日，以太原城的被攻破为标志，阎锡山失去了在山西的最后堡垒，“山西王”的历史划上了一个暗淡的句号。

从“山西王”的宝座上跌了下来之后，败军之将阎锡山在蒋（介石）李（宗仁）矛盾的夹缝中“因祸得福”，于1949年6月13日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入主中枢，为国民党苦撑残局。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阎锡山激流引退，于1950年3月15日卸行政院长任，归隐山林。居于台北阳明山之菁山草庐，十年如一日，从事著述，写成《大同之路》、《三百年的中国》等书，计三百余万字。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因急性肺炎、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

病医治无效，病逝于台北台大医院，终年 77 岁。

（二）经略山西的阎锡山

阎锡山既饱读经史，又涉猎近代科学，在他身上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

阎锡山 6 岁开蒙 入村私塾 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学起。三年以后，转入村义塾，研读《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及《纲鉴易知录》等。到 15 岁习商止“四书五经多能随口道出 纲鉴大事亦知概略”传统文化的根基由此养成。1899~1900 年间，因生意受挫，又不得不辍商求学，再入村义塾，一边温习经史，一边选读子书，进而“注意研究程朱陆王之异同，摘抄古圣贤修己治人之名言，自题曰补心录”。通过前后十年的村塾学习，阎锡山对经史子集广泛接触，博闻强记，具备了较为坚实的旧学基础。自幼奠定的童子功，弥久不衰。1950 年夏初，阎锡山“初由台北市移居阳明山菁山时，随从人员愿集体读诵经史，谈说进度时，先生随口说四书孟子文较多，不过 34680 余字”就是最好的佐证。

阎锡山虽然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对传统文化派生出来的八股取士制度却深恶痛绝。认为，“为笼络才智而开科取士，亦为维护君位的一个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发展到八股文时代，可谓极尽控制人思路、耗竭人脑力的能事了。我就读私塾时，尚习作八股文，深感其人在人脑中是悬崖绝壁，有时苦思终日，写不出一个字来，不同于研究科学之有道路，有阶梯。所以我常说：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也正因为如此，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他对自然科学与近代军事兼收并蓄。进入山西武备学堂后，阎锡山在学习军事科目的同时，开始接触数学、理化、史地等学科，自然科学的声、光、电、化给青年阎锡山展现出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新世界，引起了浓厚的学习兴趣。由于

勤奋刻苦，武备学堂三年的学习，阎锡山学、术均佳，尤擅操典。

留学日本的经历，更使阎锡山得以走出国门看世界，亲身体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近代文明，进一步涉猎西方文化。一踏上日本的土地，阎锡山首先感受到的是日本先进的社会秩序。他说：“‘日本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其次是接受了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由于对清廷腐败和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不满，“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由于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认识到“政治不可失时，若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一定要被时代所抛弃”，毅然参加同盟会，并成为铁血丈夫团的一员。

三个时段的学习，不仅奠定了阎锡山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而且使他得以接触“新学”，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和近代军事。二者的矛盾与统一，构成了阎锡山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典型形象——他的精神世界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阎锡山毕生奉行“中”的哲学，主张“执两用中”，“不偏，不过，不及”，就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他极力提倡“大同主义”，追求所谓“大同世界”，无疑是继承了孔子的“大同思想”。他的物质世界，亦即他的“用”则是仰赖西方近代文明。阎锡山在山西注重发展近代工业，大批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着力于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同时，把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提出“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之三大义务”的口号，在普及国民教育上下功夫。这一切无不是吸收近代文明的结果。

阎锡山早年参加同盟会，在发动武装起义，光复太原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同年10月，阎锡山宣誓入会，成为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随即加入军事核心“铁血丈夫团”，参与谋划将来发动全国性武装起义时的“南响北应”战略。1906年夏，他借从日本

振武学校肄业，准备入日本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的间歇，接受同盟会总部发动革命的任务回国探亲，随身携带两枚炸弹，以备日后武装起义之用。三个月的探亲期间，阎锡山花费大量的精力在五台山周围各县和雁门关内外商人、僧侣、教师、学生中宣传革命，鼓吹反清。

1909年，士官学校毕业返回山西后，阎锡山利用职务之便——先是陆军小学教官、监督，再是第八十六标教练官（副职）、标统，与其他同盟会员一道开展兵运，并通过推行征兵制、建立模范队、让一批有文化的同盟会员下连队当兵，深入兵棚，发动新军士兵，为武装起义做了必要的准备。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到太原起义前，“我的第八十六标的三个管带张瑜、乔煦都是我们的坚强同志，其余下级军官，都很可靠。……骑炮营是些老军人，不赞成也不会反对，且炮兵中有不少下级军官和头目是我们的同志，可能控制该营”。

武昌起义爆发后，山西巡抚陆钟琦急电驻在平阳府的总兵谢有功，调集所部马步七旗，集中平阳府待命；并令加强黄河河防，饬令亲自部署巡查；电到即行遵办，不得稍有迟延。又于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四）在太原召集军政官员开会，决定将分驻各地的巡防队调集太原，震慑省城；将第八十五标黄国梁部开往蒲州，第八十六标续调代州。面对突然事变，阎锡山与温寿泉、赵戴文等同盟会骨干及黄国梁等革命的同情者紧急会商，决定于第八十五标领到弹药准备开拔之前一举发动起义。1911年10月29日（农历九月初八），第八十五标首先起义，攻入巡抚衙门。根据事先部署，阎锡山的第八十六标随后发动，负责守护军装局，击散守卫抚署的巡防马队，并协同第八十五标攻打新满城。随着新满城的攻克，太原宣告光复。随即，阎锡山被推举为山西都督。

阎锡山推行“村本政治”，实施“六政三事”，倡导“厚生”，客观上促进了山西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阎锡山兼长山西军民两政后，以“保境安民”相号召，为山西赢得了个休养生息的外部环境。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山西省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

在此期间，阎锡山首先推行“行政之本在于村”的“村本政治”。一方面首创村一级行政建制（后在县与村之间又设置区），把行政管理的立脚点放在编村（相当于后来的行政村），统一与健全了行政管理网络。另一方面推行“用民政治”，从所谓“民德、民智、民财”三者着手，“然后能用之而有效”。通过整理村范（将村中包括贩卖吸食金丹料面、窝娼、盗窃、忤逆不孝、打架斗殴、游手好闲等“危害人群”的十种人进行管教、劝导，直到处罚，抑恶扬善，达于“仁化”），村民会议（阎锡山设想中的村级民意机关，职权是选举村长村副及村监察委员，议定村中有关事项等，意在进行“民治之训练”），村禁约（阎锡山称之为村宪法，即由村民自己定立、共同遵守的条约，对全体公民皆有约束力），息讼会（阎锡山称之为村司法，由村中选举年高德劭能主持公道的人组成，专事调解村民之间发生的纠纷，亦即村民调解委员会），保卫团（阎锡山称之为村武力，由村中 18 岁以上、35 岁以下的壮年男子组成，专司村中治安保卫之职），实现了所谓“把政治放在民间”，以达于“训政”。村本政治促进了用民政治，用民政治稳固了村本政治，二者相辅相成，奠定了山西地方自治的基础，农村基层政权设置得以规范，农村社会得以安定，广大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选举权。

与村本政治并驾齐驱的是六政三事的实施。以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种棉、造林、畜牧为主要内容的六政三事是阎锡山对山西社会经济（主要是农村经济）进行初步改造的重要举措。虽然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成效还是显而易见的，“六政则剪发最好，天足、水利、种树、

蚕桑次之，禁烟又次之；三事则种棉最好，造林次之，畜牧又次之。”——截止 1918 年底，全省各县男人发辫已完全剪尽；1921 年全省 105 县中有 87 县 10 岁以下的女子“已全数天足”，101 县 16 岁以上的缠足女子“已全数解放”；水利方面，通过开渠、凿井、筑蓄水池等共新增水浇地二百余万亩，全省人均 2 分（按全省人口 1000 万计）种树实栽 51521985 株，人均 5 株，成活 29455834 株，人均近 3 株；共栽实生桑 121291777 株，人均十余株；养蚕 7866219553 头；戒烟方面，仅据统计，截止 1921 年，戒除烟瘾的达 12 万人次；全省棉花产量，1918 年为 17703753 斤，1921 年为 37612720 斤，四年翻了一番还多；造林方面，1919~1921 年播植面积合计 6742 亩，1920、1921 两年造林面积合计 244124 亩、造林株数合计 42141642 株。收到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

在实施六政三事，兴利除弊的基础上，1925 年初阎锡山又进一步提出了“厚生计划”，在山西进行实业建设。一方面制定炼油、炼钢、机器、电气、农业、林业等六大计划案，兴建官办工业，发展兵工；另一方面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实业发展的政策，采取了一些奖掖工业的措施，鼓励开发实业，以厚民生。从而使 20 年代的山西官办近代工业开始勃兴，军事工业初具规模，私营资本主义进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民族危机面前，阎锡山倡导“自强救国”、“造产救国”，发起“十年省政建设”，奠定了山西近代工业的基础，增强了山西的经济实力

阎锡山首先主持制定了详尽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计划案以“力图自强，以为挽救，冀立国于世界”为出发点，详述政治经济的既定目的。规定：在政治上应确定均权制度，以期共治；树立廉洁负责政府，积极训练人民政治知能，并促进政治经济合一之地方自治，以推进民主政治之实现。在经济上尤应大规模开发物产，如矿产之开发，工业之振兴，农业之改良，以及交通之建

设，凡可以增加输出，减少输入者，均须就其范围，俾人尽其力，地尽其利。计划拟前三年以政治为中心，注重扫除建设障碍，确立民主政治基础；后七年以经济作中心，以完成自足为目标。关于政治建设，计划案列举了改善现行政治必成、期成的 17 大事项，包括警政、财政、教育、文化诸方面。关于经济建设，计划案中农业、矿业、商业、交通无不涉及，各个门类都提出了必成、期成的具体指针。如水利，要求十年后增加水田 800 万亩为期成量，400 万亩为必成量；如交通，把修筑同蒲铁路列在首位。同时还提出扶助社会办理之实业事项和发展公营事业等项，前者主要有发展毛纺织业、酿造业、化妆品工业、造纸工业等；后者则包括整理山西省银行、壬申制造厂、育才各厂等，创办炼钢、肥料、毛织、纺纱织布、卷烟、苏打、洋灰、印刷八厂等。作为山西省历史上第一个建设计划，计划案无疑有它的积极意义，对于指导省政建设不无裨益。

在计划案的指导下，1933 年 2 月 21 日，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成立；同年 5 月 1 日，同蒲铁路正式开工，以太原为起点，分别向南北推进。同蒲铁路是山西地方政府主持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全长 850 公里，南段长约 500 多公里，北段长约 300 多公里，且地形复杂。如此浩大的工程相对于当时山西的财力显得力不从心，阎锡山从以有限的财力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考虑，决定同蒲铁路采用窄轨，同时起用兵工筑路，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南同蒲 1936 年元旦全线通车，北同蒲于抗战爆发前基本完工，通车至雁北怀仁。同蒲铁路在阎锡山的亲自主持下以最经济的办法修成，其建筑费全线为 1650 万元，以长 850 公里计，平均每公里为 2 万元，不及普通标准轨铁路预算的 20%，同时也大大低于同期国内的平均造价。同蒲铁路贯通山西南北，北可以联络平绥，南可以衔接陇海，东经正太以通平汉，西由太碛以达黄河，是为山西的交通大动脉。它的开通大大方便了山西省内交通，以及山西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对山西政治、经济、军事 尤其是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十年建设计划中，经济建设是重心，发展公益事业是重中之重，而公益事业的集大成者则是西北实业公司。西北实业公司酝酿于1932年初，正式成立于1933年8月1日。西北实业公司以“开发西北各种实业为宗旨”，由于阎锡山的高度重视和知人善任，迅速发展，从初创到抗日战争爆发，短短几年中由原有的几个分厂一跃成为拥有2万员工、33个工矿企业的大型集团公司，其经营门类涉及兵工、冶金、化学、煤矿、洋灰、造纸、纺织、火柴、卷烟等。据南京国民政府对“1928~1936年全国最重要工业”的统计，西北实业公司的工人数（18597人）占到全国产业工人总数（405509人）的4.6%；全国2826家最重要工厂共有资本3.129亿元，厂均资本11万元，西北实业公司1936年所有的33厂共有资本0.22亿元，厂均资本66.66万元。西北实业公司不仅门类齐全，而且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其产品不仅供应省内市场，而且还远销他省。西北实业公司的发展壮大，使山西逐步形成一个规模可观、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体系，从而在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卷烟业诸方面为山西近代工业起了奠基的作用。山西地方在西北实业公司时期形成的以重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同蒲铁路的修筑，西北实业公司的设立和迅速发展，以及这一时期阎锡山主持进行的其他省政建设，从积极的方面看，对于山西摆脱中原大战造成的负面效应，恢复和推动山西经济的发展，增强山西地方抵御外侮的能力，以至坚持八年抗战都有着一定的作用。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阎锡山坚持了抗日立场，其间虽然出现过一些曲折，但是大方向始终没有改变

就在阎锡山一门心思进行省政建设的同时，日本发动了旨在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华北事变，直接威胁到山西。日本在政治上以重掌华北军政为诱饵，策动山西“自治”；经济上以商品倾销削弱山西货的市场。阎锡山从日本直接威胁山西的现实中感受到寇深祸亟迫

在眉睫，从民族立场和山西地方利益出发，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选择了抗日、联共的道路——1936年9月，他同意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与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共商保晋大业”，同中国共产党结成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1936年11月，面对日伪军的频繁挑衅，他组织发动绥远抗战，是为华北抗日的先声；与此同时，他在全中国独树一帜，明确提出“守土抗战”，动员民众，准备抗战。正如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所说：“山西以一隅之地，进行了守土抗战，收罗进步青年，成立牺盟会，解放思想自由，允许开设生活书店。我看到山西是有了光明，虽然是仅仅点出一支土蜡烛来，光明不大，但我却和许多爱国的青年一样，像灯蛾似的，围着这一点儿光明，不肯他去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职衔总领晋绥军务，礼迎八路军进入山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初期，阎锡山亲临作战第一线指挥督战，平型关会战、忻口战役，艰苦卓绝。在娘子关陷落、太原不守的严峻形势下，撤兵晋南，转战晋西敌后，持久御敌，一直到抗战结束。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因晋西事变与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摩擦加剧，统一战线险遭破裂，由于中共的主动议和而得以维持。1941年前后，在日军加紧封锁，政治、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阎锡山响应日本方面的和谈要求，多次派员与日本军方接触议和，但始终只停留在协议上，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山西的抗战局面一直维持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三 坚持反共立场的阎锡山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世界风云变幻。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链条上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开始探

索新的民主主义道路。1919 年中国爆发了闻名于世的“五四运动”。阎锡山敏感地意识到新的世界潮流——社会主义运动必将对他和他的既得利益构成新的威胁。从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反共立场出发，阎锡山断定，是资本主义的弊端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发生，而社会主义又将产生新的“弊端”。为了寻求一种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适中”制度，他召集山西学政各界及社会贤达，在督军府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举行进山会议。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的例会一直进行了两年又四个月。会议议题由“人群组织怎样对？”进一步及于“人生与家庭的研究”、“经济制度的研究”、“教育的研究”、“政治的研究”等等。会议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之弊在“资本生息”、“金银代值”，所谓人群欲成于制度者何也？金银代值，资本生息是也。自金银代值资本生息以来，人皆贱布帛菽粟而贵金银；是以人皆不存布帛而争聚金银；舍耕织而专以掏金挖银是务矣！”由此出发，进一步演绎为：共产主义否定了资本主义的资生息、金代值，要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违背人性，反乎人情，不适合生产，不利于人生”，是“强人作圣贤，又强人作禽兽”。有鉴于此，只有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的“公平制度”。从而为阎锡山奠定了以抵制共产主义运动为出发点的反共理论基础。

阎锡山对于反共理论的探索在进山会议后继续深入。集数年研究之心得，1928 年 9 月，在北平对法国记者提出“劳资合一”问题；1929 年 9 月 24 日，在太原成立“劳资合一研究会”；1930 年 1 月 25 日，在劳资合一研究会提出“公平制度之研究标准”。1931 年，中原大战失败下野避居大连后，“乃与随行人员及陆续远来相访外客旧属等，屡作研究问答，记录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孰好孰坏孰难孰易之研究》”提出了“资公有”、“产私有”、“物产证券”和“土地村公有”的阎氏理论。进一步主张“物产证券”，亦即以票券的形式证明物产价值，充当现行的纸币，

既用来衡量人的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又用来作为交换媒介，持券按物的价值来兑物；“土地村公有”，亦即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然后划分为若干份地，再分配给耕作年龄（18~58岁）内的农民耕种，政府通过按规定收取各种税款作为担保。前者的出发点在于彻底否定“按劳分配”的马克思主义分配观，后者则既标榜奉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又与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争夺民心。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阎锡山一步步感受到了存在的威胁。然而，他首先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因此，在政治上倡导“公道主义”，组织好人团（亦称公道团，阎锡山的官办团体）。他说：“共党号称有主义，有组织，其目的在推翻现社会。他们的组织很严密，所以与官军对抗时十分顽强。我们要剿除共党，不能和剿除流寇一样。他有主义，我们也要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他有组织，我们也要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在阎锡山看来，公道主义既是调整人群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各种复杂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解民于倒悬的“济世良药”，还是对人群实施管理的精神约束，是为政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和条件。即所谓：“无仁爱公道，食衣住用即失其保障，是仁爱公道一贯为人类之生命。”“公道为政治枢纽，合之则治，离之则乱。”“官当以公道制人，不可以权力擒人。”在军事上实施“防共”“剿共”。1935年9月议决办理“防共保卫团”、划分防共区、防共区内各县联防、沿河各要隘建筑碉堡等。随即把全省划分为12个防共保卫区，并设立带有军事性质的基层防共组织“山西防共保卫团”，其职责是“平时好像宪兵警察，维持地方治安，红军来时用他们前去抵御”。在此之前，1934年冬，派出第七十一师方克猷旅进驻河东之离石军渡和河西之宋家川、绥德等地，配合陕军之井岳秀、高桂滋部围剿陕北红军。随后，又任命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为“陕北剿匪前敌总指挥”，进驻晋西重镇柳林，指挥所辖孟宪吉旅、

陶振武旅、马延守旅，以及临时附属之陈长捷旅、方克猷旅，参加陕北“剿共”。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阎锡山的反共军事改为以防为主，除以原河防部队继续实施防御外，又进行了纵深配置——任命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为总指挥，把晋绥所有7个师的兵力，编为4个纵队，各纵队均附设炮兵一个团，并以炮兵副司令刘振衡为炮兵总指挥，随时准备应战。

1936年2月20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突破阎锡山的河防工事和碉堡封锁线，实施东征。阎锡山一面调兵遣将，全力阻击；一面急电蒋介石中央速派援兵。3月6日，阎锡山下达总攻击令，发起汾孝会战。调集14个团的兵力，在汾阳、孝义一带，与红军激战，迫使红军变更战略，兵分两路，转向晋西北、晋南挺进。3月21日，在蒋介石派出的10万援军陆续赶到后，阎锡山再次向红军发动进攻，指挥晋绥军各部及中央军援晋部队，在晋西北、晋西、晋西南以至晋南的广大地区与红军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红军回师陕北。

在经过准备抗战时期和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的合作抗战阶段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发展、日益强大，主要表现为：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影响与日俱增，并在广大的战区和敌后实际起着政权的作用。二，以抗敌决死纵队为代表的山西新军不断壮大——1938年冬，仅决死纵队各部即发展到43个团，4万多人。此外还有大约20个团的游击队、自卫队等非正规部队。其时，南京政府给山西的军队编制番号共150个团，阎锡山给了新军50个团的番号。旧军（指原晋绥军）从雁门关一带溃败下来，只剩下名额不足的四五十个团。实际上当时新军的数量已占到了山西军队的二分之一左右。三，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三大主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通过山西挺进敌后，迅速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块抗日根据地。与